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四期 ——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1d)

---

【当事者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聂元梓
【史海钩沉】乔兼武“造三个大反”	扬子浪
【历史资料】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乔兼武·杜文革
【童年旧事】荒诞的年代，困惑的童年	查维成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九）	老 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当事者说】

###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 聂元梓 •

#### ◇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总支书记谈话，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也找我，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提意见。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确实有意见，而且认为这意见很重要。

就拿陆平来说，我认为他有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情况，下达指示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上级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很少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

我认为他还有宗派主义。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正常

的组织机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是从铁道部调来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是陆平的“亲信”。这使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陆平对党外人士也有宗派主义。例如，副校长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得不到尊重，没有实权，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陆平对各系的党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信任不足，党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种风气。

我还提了一些“左”的意见，比如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而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张磐石把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经中宣部汇报给中央书记处，听说在报告中引用了我的话，作为重要论据。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工作的重视。这样，经过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组织工作队进驻北大，成员都是各省市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准备从北大取得社教运动经验，然后推向全国各高校。

1964年10月，工作队进学校以后，往各系都派了人，大规模地发动党员，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重点，张磐石亲自抓。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有拥护陆平和校党委的，也有对陆平等人持批评态度的，仍然是以系里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分歧为焦点。工作队把党员教师和干部找来开会。一开会，两派意见就都提出来了，算起了前一任党总支改选问题的旧账，自然就涉及到陆平的用人原则什么的。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听取群众意见。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和陆平无冤无仇，说起来，我还是通过哥哥聂真找到陆平调来北大的，先后安排我担任了经济和哲学两个重要系的领导工作，陆平对我个人确实很好。我本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改进工作。事情搞起来了，火药味很浓，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

正在这时，彭真知道了这些事情。1965年6月下旬（时间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彭真召开一个党员干部会议，当时彭真讲了好多话，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因此，张磐石受到批评和处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接替张磐石担任工作队长，队员则以放暑假的名义离开北大。工作队撤走以前，找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问：工作队为什么要走？他们说，因为彭真讲话了，彭真要我们走。

#### ◇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几天以后，积极分子被抽调了一部分，在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名义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学校工作”。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还说：要刺刀见红。可见当时的空气多么紧张了。

会议期间，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被隔离，由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的房间里，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被监视了。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主持会议的是许立群。国际饭店离北京市委很近，便于他们掌握会议情况。彭真在小楼里指挥，市委书记刘仁等人也都到会了。结果呢，会议开得时间越长，不同意见就越对立，两边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说来说去，暑假都过去了，连招生工作都受到影响，北大那年少招了几百人。

到了10月份，经过考虑，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是托田家英转的。信上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工作队动员的，即使有错，也是难免的，不应该受到追究。这些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社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我写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反响。

那时候我真傻。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又怕中央把信转到北京市委，彭真他们再说我越级上告，给我增加罪名，就把这封信抄写了一份，送到北京市委的收发室，要求交给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实，大人物要整小人物，还讲什么把柄不把柄，后来的遭遇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校党委决定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也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我们这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都是准备放下去就不收回来的，听说是学校不要我们了。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被分配到怀柔县去搞“四清”。

#### ◇ 曹轶欧进入北大

1966年初，曹轶欧带着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张恩慈本来是哲学系的教师，刚调出去不久，现在又跟着曹回到北大。

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我去怀柔看地方之前的某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去见她。她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我说，现在让我去参加“四清”，我就执行党委决定，下乡去就是了。曹轶欧说，那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说，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后党委怎么个说法。我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是动员我给学校和陆平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残酷斗争，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我这样消极，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 ◇ 晴天霹雳般的《“五一六”通知》

我正准备到怀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学校党委5月19日晚传达文件，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消息。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同时传达的，还有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和“反党集团”的定性。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仍然危机四伏，而且，进行反党反毛主席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我想，中央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吗？矛头不也是对准走资派的吗？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是受批判的，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采取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因此，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得了。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

#### ◇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系里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多，讨论写报告的事。本来是要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听了表示赞成。因为以前我已经给毛刘写过报告，还是请田家英直接转交的，结果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能让校内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写信管用。

因为我们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李雪峰是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可他还是华北局第一书记，他的办公地点在华北局还是在北京市委？到哪里去找他呢。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

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我们，在西颐宾馆的客房接见我和杨克明，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拐角的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也在场）。曹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不知道行不行。她说，《“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而且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

####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剑多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人一起讨论，宋一秀改了第二稿，这已经是5月24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前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就行了”。5月25日一早，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在后边加了一段话和三个口号，就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

住在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

抄完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彘、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由别人代签的，这是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午休过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或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 ◇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既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的。近些年的报刊上，这一类不负责任的捏造太多了，但由于处境不利，我却无法为自己进行公开辩护。

我们的大字报，完全是在《“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年报纸电台和中央文件一贯使用的一些字句和概念，是特定时代的火药味十足的、杀气腾腾的语言。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结合了北大的实际，把陆平、彭佩云和他们的上级宋硕关于如何领导运动、控制局面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当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基层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下怀，对后来的形势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给陆平、彭佩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

其实，大字报问世不久，就有人指责我发起写这张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投机”，这真是无稽之谈。我提议写它的时候，怎能料到它会得到毛泽东那么高的评价，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尽管这件事大错特错，但它与“投机”无缘。

还应当补充的是，为什么要赶在5月25日中午把大字报贴出去，这里有一个“斗争技巧”问题。当天下午，校党委原定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三家村”。我们觉得，这是他们为掩盖前一阶段的“假批判、真包庇”，试图化被动为主动，因此，为了不让他们“阴谋”得以实现，我们就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及时“揭露”。这完全是当时的想法。

#### ◇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的大字报在北大掀起了轩然大波。事情非常巧合，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党反革命大字报；当然也有赞成的，自然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人越来越多。高云鹏还受到了围攻和推打。

当晚，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面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什么态度？中央会有什么态度？请他帮我们请示。张恩慈在电话上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着急，请示以后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紧跟着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红色电波传喜讯”。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几天来这张大字报引发的是是非非给我心头造成的压力，一扫而光。而且，党中央对大字报评价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非常兴奋。

那时候，我哪里想得到，这是一场民族大动乱的开端呢。

◇ 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判决的要点

1、按照江青的授意，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活动。

2、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亲笔写信给聂元梓，要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

3、在得知戚本禹诬陷“朱是反毛的”讲话之后，即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对朱德委员长进行诬陷。

4、伙同孙蓬一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

5、在篡夺北京大学领导权期间，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二百余人被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6、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反革命小集团”冤案。

法院认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法院据此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往事》编者的话：聂元梓已是八十三岁的老媪了。她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十四岁参加革命工作，十九岁去延安。文革中，她因钦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名扬四海，也因这张大字报而罹祸殃。文革结束近三十年了，然而，文革的阴影在她身上仍挥之不去。她的荣辱悲欢始终和毛泽东有不解之结，包括文革后期她失宠于毛泽东。

读聂元梓的这篇文章，想起陆游《钗头凤》的慨叹：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是在这种体制下，历史的荒唐捉弄出来的“错错错”。

错之一：聂元梓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两次婚姻都是嫁给革命干部，按说她应该属于建国后形成的干部阶层。如果没有这张大字报，如果这张大字报没获“圣眷”，她应该是“走资派”而不是“造反派”。

错之二：文章里提到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聂元梓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正是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北大著名右派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的地方。有议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可以设想：

如果事发在五七年，她肯定被打成“右派”而不是被推为“左派”。

错之三：聂元梓很在乎“组织原则”。但她似乎没有明白，所谓“组织”就是执政体制的“层级结构”的金字塔，而处于顶端的领袖，可以是“非组织原则”主义者。当聂元梓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请示了曹轶欧之后写了大字报，自以为遵守了“组织原则”，却不知不遵守“组织原则”的就是“组织”。

聂元梓笔下的“社教运动”让我们想起“反右”运动中著名的三段式：动员一鸣放一整肃。文革更是它的发展和极致。一部党的“路线斗争史”似可以归结为整人一挨整一整人一挨整……的连续过程。结果是，无人不挨整，无人不整人。夏衍先生诗云：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乃“整人文化”之活形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整人文化”在全社会的扩散而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在“东风恶”、“欢情薄”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岂不“错错错”！

令人不解的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空洞无物，只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激励下一味“上纲”而已，怎么就被钦定为“马列主义大字报”？聂本人今天也莫名所以。

聂等人的大字报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内容。它振臂一呼，在响应《通知》对“走资派”宣战的同时，发泄出压抑已久的对“社教运动”后期挨整的不满，也包含着对日益固化的社会机制的不满和新的企盼。这种不满是带有一定社会性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种情绪，更利用了这种情绪，用以“发动群众”点燃“文化革命”之火，于是，这张大字报于风云际会中应运而生了。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想“运动群众”，那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代表了“群众运动”的兴起。结果是“群众运动”脱离了“运动群众”者的掌控，天下大乱。钦定“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难免充当了替罪羊。

“大字报”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八年，我们应该倾听当事人的自述，虽然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者的立场。

本期还摘编了对聂元梓的判决书。聂元梓因大字报而成名，亦因大字报而损誉，但判决书对此只字未提。两相对照，读者自会体味。）

□ 载《往事》第四期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

【史海钩沉】

乔兼武“造三个大反”

• 扬子浪 •

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文革初起时，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学生。乔俊礼改名乔兼武应该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之后。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代表百万红卫兵，为毛泽东带上了红袖章。毛泽东嫌她的名字太文质彬彬，讲了一句“要武嘛”，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乔俊礼受此影响必嫌原名“俊礼”又是俊美又是知礼，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也随全国的改名狂潮改了名字。但乔仍是北大学生，受过多年良好教育，内心深处自有一定的文化品味，没改成“要武”或“向东”之类，而是“兼武”。“兼武”乃是知文兼武或是文武兼备的意思，和纯粹要武自有天壤之别。可见在毛泽东连番向青年学生扔出精神原

子弹，对他们的常识和良知进行狂轰烂炸后，乔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笔者当年也是北大学生，十分关注校内外的文化大革命。据我的回忆，乔兼武在北大文革中出了三次风头。风头即风头浪尖的意思，笔者在这里用此词毫无嘲讽之意。才华横溢，青春正盛的青年学子在历史的大风浪前，有几个能稳坐钓鱼台的？他们要学海燕搏风击浪，这是青春的召唤，为上帝所默许。

乔兼武第一次扬名燕园，应该在八月中上旬。他贴出大字报倡议建立“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干革军子弟协会”。并在大字报上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乔兼武。这在北大几乎成为笑柄。尽管当时社会上血统论开始盛行，但自报家门十三级干部子弟总是略显滑稽。当年北大高干子弟多如牛毛，在他们看来，你区区十三级芝麻小官也来炫耀，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占大多数的平民子弟，能进北大也总有一定才智，对夸耀父亲官位的人当然也相当不屑。笔者记得在乔的这张大字报上，北大学生批满了各种尖刻的评语，极尽取笑和挖苦之能事。

乔兼武第二次在北大文革舞台亮相则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大约数日以后，乔兼武皆同杜文革（原名杜文中）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乔兼武要造的第一个大反是“党团组织”。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修正主义、投机主义、反党黑帮及至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和根源。这个观点是乔整张大字报最耀眼的思想亮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文革宝典“小红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在文革中被亿万人，从教授到掏粪工，在无数的场合，从家庭会议到百万人的群众大会，所反复诵读。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毛语录。就是这样一个被捧作神明的党乔兼武居然要取缔。可见思想一旦被打开牢笼，就会振翅高飞。乔兼武要造的第二个大反是“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及其文革集团要在五个月后才用同样的名字命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乔兼武要造的第三个大反是“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乔兼武当然知道他要砸烂的是包括毛办，林办，周办，康办在内的一切办公室。“造反有理”在乔兼武的大字报中被推演到了极至。就差没有造毛泽东本人的反了。中国青年学生还需要经受更多的苦难，才会把以造反蛊惑青年的毛泽东本人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乔兼武的大字报贴在北大著名的交通要冲三角地，当时就引起了震撼性的轰动。晚上十时北大全校就召开了批判斗争大会，挑灯夜战，批判乔兼武的反动言行。大会应该是北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组织，在北大五四操场举行，约有几千人参加。一九六六年八月“飞机式”还没有流行，因此批判斗争大会开得还算文明。但大会主持人一开始就要求乔兼武低头，并宣布乔是阶级敌人。但仍有不少同学在文革发动期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上台发表不同意见。一位东语系的同学上台为乔兼武辩护。他认为乔兼武的大字报是反动的，但乔兼武本人不一定反动。这种不能以言定罪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都不能或不敢接受。这位勇敢的同学，遭到了围攻，许多人呵斥他，大会主持人还要撕他的红卫兵袖章。他当即表示抗议，退出了会场。笔者当时也在人群中起立表达抗议。在群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下，大会主持人对乔兼武的态度渐趋缓和，后来甚至拿了张椅子给乔兼武坐。因为是夏末秋初，又是室外深夜，主持人最后还拿了件衣服让乔兼武披上御寒。乔兼武杜文革俩人当天贴出大字报，北大全校晚上十时开批判斗争大会，可见大字报之轰动。好在当时武斗尚未成风，派性恶斗也未成型，乔兼武居然逃过一劫。“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麻烦，他仍保有自由之身。

如果说乔兼武第一次出场是笑剧，第二次出场是轰轰烈烈的正剧，则在北大第三次出场就是悲剧了。尽管受到大规模的批判，乔兼武并没有放弃思想和对“造反有理”的真诚信仰。大约又过了好几个月，或者更长。笔者记得读到一份报道消息的大字报。内容是乔兼武如何书写反动日记，如何组织反革命组织，因此已被正式打成反革命并且逮捕。是被群众组织关押，还是公安机关正式逮捕，笔者已经不记得了。由于当时文革高潮叠起，两派恶斗越演越烈，因反动日记入狱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尽管现在看来充满了文革语言，很多提法也相当幼稚粗糙。但它是一个标志，是文革中一股贯穿始终的异端思潮的先声。文革中某些人的思想行为与当时文革操纵者的思想行为不合拍，按当时时髦的提法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例如联动要保爹保妈，反对打到一大片。再如“四一四”反对全面否定“十七年”，主张造反派只能造反不能掌权。这些虽然称得上思潮，但在真正的意义上不能算异端。至于林昭，顾准，尽管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摆脱了马列主义的巢穴，但它们是藏于密室中的宝石，虽然光芒万丈，还有待于后人的发现。在文革中真正称得上异端思潮的，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完全另起炉灶这一思想脉络。从乔兼武的“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开始，到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张大字报，再到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直至王希哲在后文革时代的一系列文章。这一思想脉络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又实行全民普选的巴黎公社。笔者在文革中偷读“杜勒斯回忆录”。在书中杜勒斯提到，他在大学中选修社会主义理论，曾十分惊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不同。杜勒斯当年无意的惊讶造成了笔者醍醐灌顶般的觉醒。将近四十年后，笔者在全书之中就记住了这一句话。乔兼武要取缔一党专政的党团组织，杨小凯主张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到后来王希哲提出相当成熟的政治主张：即认会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共产党一党专政，应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多个政党通过民主竞争来实现。他们都抛弃了列宁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寻找武器。这特别可以从杨小凯和王希哲的多篇文章中得到印证。乔兼武的大字报应该是这一思潮最早的一次澎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青年没有机会接触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能公开接触到的唯一不同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利用这一思想资源，勇敢地发出了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历史性呐喊。乔兼武和他的“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在文革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根据十分约略的日记和零碎的回忆写下此文，希望能对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同时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知情者，特别知道乔俊礼如何入狱及入狱后的情况者能撰文补充。

~~~~~

## 【历史资料】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 乔兼武 • 杜文革 •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提出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旧世界的汪洋中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更把马列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天才地创造了现今改造世界的最强大最伟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它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在从旧世界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仍然大量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且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还在产生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修正主义思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艰巨卓绝而又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意义的工作，还仅是开始，远没有结束。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

造，还在沿用着这些腐朽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应当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才一百余年，作为一种学说，是已经确立了，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战胜它的顽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远没有砸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们国家现行的各种制度，从党政机关各种制度，到工农业生产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到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营业制度，到教育界、新闻界、历史界、文艺界的各种制度，总之，包括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来批判、改造它们，要破字当头，在大破中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制度，以便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就提出三个破旧立新的大胆建议。

####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以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动员组织领导其它阶级、阶层的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适用和必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 一、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1.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应大搞特搞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们不利于搞群众运动，因而，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智慧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运用。
2. 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像接受新党员的表决权等），因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全党在搞。
3. 由于他们不受群众监督，尤其是那些反党黑帮分子，肆意对抗党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往往以反党大帽子压人，因而，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他们搞阴谋以篡党、篡军、篡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 它们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妨碍领导与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5. 它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
6. 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考验一辈子，采取入党的方式检查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一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7. 和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思：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8. 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反映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 二、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它的最低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最高纲领：在全球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的选举制：《十六条》第九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人民才有选举权，敌人没有选举权。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 三、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1. 党中央一级不能改选，但要更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林彪同志任副主席，由他们二人负责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它原则上应以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基础，只把那些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清除出去。

2. 军队各级党组织原则上也不改选，只要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适当地调配即可。

3.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可指派专人到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先组成地区、省市、自治区两级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暂时代替这两级的原党组织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改革党、团组织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做，这是由全国当前革命形势决定的。目前，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很多党组织不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他们镇压、迫害，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是：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已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展开了大搏斗，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组合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伟大阶级斗争时代。代表反动势力一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凭借职权，占着优势，疯狂地向革命势力反扑。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斗争形势，以使斗争有利于无产阶级，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敌人越猖狂、越挣扎就越临近灭亡，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就越临近更加伟大的新胜利。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透过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看到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纸老虎本质，狠狠地打击他们，把他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胜利。它将为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下可靠的基础。

##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用党政两套组织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业务又是紧紧相连的，二者绝对不可分割，正像人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刀子和锋锐不可分割一样，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但是资产阶级的党政两套组织形式，人为地使政治与业务分离，形成党组织是抓政治工作的，政府就是搞建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造成国家机构庞杂，浪费人力物力，搞繁琐哲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因而应该立即废止，实行党政合一，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任务。下设各种组织机构，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反对党政两套，而且臃肿庞大的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

##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办公室，到茅房草舍、田间地头、到工矿企业、到厂房宿舍、到军队驻地营房、到柜台边、到一切有群众的生产部门、单位、农村、工厂，把办公室牢牢地建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做既劳动又办公的人民勤务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一个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三脱离干部，一是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看不到群众的一点情况，觉不出群众的一点阶级感情，不知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实际；三、脱离生产劳动的边。他们难道能够领导群众干社会主义？难道能领导好？他们难道能做群众的勤务员、一个普通劳动者？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领导只能是反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修正主义的领导，作官当老爷的领导，根据自己的意愿乱发号施令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必须彻底反掉，换上毛泽东主义的领导。办公室工作制度的罪状与党团组织一样，而且各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更要以十倍的干劲彻底捣烂它！

在办公室里是干不成革命的，只能做官当老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旦让他三脱离，他一天也呆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砸烂它！把脚跟站在人民一边，把办公室设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都变成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劳动者。

这个重大变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以上就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就是应该造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旧东西的反，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一切！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最光荣、最英明、最天才的旗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展眼观未来，定将是赤旗寰球！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

北京大学东语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乔兼武 杜文革 八月三十日

~~~~~

## 【童年旧事】

### 荒诞的年代，困惑的童年

• 查维成 •

小时候我随父母住在南昌十中。听大人说南昌十中以前叫葆灵女中，是老南昌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男女同校后改称南昌十中。校园里的那栋四层楼的红砖大楼是南昌市中学里最好的教学大楼，解放前由美国人设计建造。我家住在教学大楼底楼的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看到前面的整个校园。文革前，校园就是一个大花园，美丽极了。这么好的教学大楼怎么会是美帝国主义设计建造的呢，而且是在解放前，也就是大人们常说的那万恶的、黑暗的旧社会。真奇怪。

父亲给我订了一份刊物，叫《小朋友》，那是我最喜爱的读物，里面有故事、儿歌、图画、谜语等，尤其是一个没几根头发、名叫小豆子的小孩，聪明伶俐，乐于助人，我好喜欢他，梦想着某一天跟他交朋友。后来有一期，讲什么批判三家村，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字，不知道是啥意思。从那以后就停刊了，我问为什么，大人说那刊物有毒。那么好看的读物怎么会有毒？我不明白。

教学大楼的后面有一裙楼，共两层，与教学大楼相通。一楼有半截在地下，是一个巨大的健身房，里面按一定距离摆放着一排排的乒乓球桌，好像是十六张，常看到学生和老师在那里打球。雪白的墙上有巨大的玻璃窗子，两边墙上各有四个红色的大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父亲说等我再长高点就教我打乒乓球，我天天都在盼长高，可惜我长得太慢。文革开始后，我一年级还没读完，那些乒乓球桌就不见了，里面空荡荡的。我听大人议论过这件事，听到了“不翼而飞”这个词，我猜那意思是说乒乓球桌飞走了。我也曾幻想过像鸟儿那样在空中飞翔，也曾独自一人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后来迷了路，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了家。那些桌子还会飞回来吗？二楼是大礼堂，文革前我在那里看过学生们表演文艺节目，“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首歌就是在那里学到的。回家后我问父亲是毛主席要听党的话，还是党要听毛主席的话，父亲叫我不要问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么普通的问题，怎么会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后来看到有人在台上打人，挨打的人不还手，还要低着头，台上台下愤怒的人们喊着口号，那场面好吓人。我以前只知道小孩子会吵架打架，所以我不想当小孩子，希望赶快长大，没想到大人也会吵架打架。

校园的过道两旁种了许多树，这样过道就成了林荫道，常有一些大人傍晚时分在那里悠闲散步。后来有人在过道两旁搭起竹棚，从教学大楼一直通到学校大门口，用来张贴标语和大字报，最早的标语有：“炮打林总照，火烧周子滔”，“打倒刘瑞森”等，刘瑞森的名字有时被写成“流泪牲”，畜牲还会流泪？下次有机会要仔细观察一下。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只是听说他们

是江西省的大官、而且是坏人，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要不怎么会把他们的名字倒着写，或在他们的名字上打叉。还有一些标语，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像童谣一样映在我的记忆里。有时大人在现场写，他们刚写出前面两、三个字，还没来得及贴上去，我就把后面一大串字说出来了，逗得那些写字和刷浆糊的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人后来还给了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把它别在胸前，感觉特精神，特神气，仿佛长大了许多，也亲身体会到了一轮红日从胸中升起的感觉。我对那些大字报的内容不是很感兴趣，只要没有我父亲的名字就行。那些大字报经常被覆盖，或者在别处看到标题相同或相似的大字报。记得大字报的落款处有各种名称，像“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井冈山战斗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等。这么好听的名字，他们应该都是保卫毛主席的，可他们为什么互相指责、攻击对方反对毛主席呢？到底谁是真的在保卫毛主席？我很想知道，但却搞不清楚。

教学大楼的后面是一个由三个篮球场并排组成的大操场，每天去食堂吃饭我都经过那里。一个大热天的下午，烈日当头照，大操场上好热闹，一大群红卫兵押着一个女老师围着操场兜圈子。那个老师是我爸爸同事，我平时叫她张阿姨。她挺喜欢我的，曾给过我好多桔子吃，还给过我许多彩色的蜡笔和雪白的纸。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办公室，叫我对着一台转盘正在转动的机器唱歌，过了一会，我听到机器里发出一个小朋友的歌声，她说那是我唱的歌。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问她我怎么会跑到机器里去唱歌，她说等我长大点再跟我解释。我还没来得及长大，她就突然变成了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脖子上挂个牌子，还挂了双鞋，头发被剪了，乱蓬蓬的。我在操场外围跟着跑，不敢靠近，怕被她看见。跑了两圈，我跑不动，又热又累，出了一头的汗，只好站在一个篮球架下喘气。不知为什么，望着那群一面走一面呼口号的人，我心里好难过，想哭，但又怕被人看见，赶紧回家，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房门，一进房门就忍不住，失声大哭。过了一会，父亲下班回来，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实话，骗他说在外面跟别人打了架，他不停地追问跟谁打架，哪儿打痛了，我答不出来，他后来气极了，给了我一巴掌，顿时，我的哭声停止了。以前是挨了打再哭，这回正好相反，不知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把事情真相告诉父亲。

一天，外面传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要来学校与毛泽东主义战斗队进行战斗，所有住在学校的小孩子都被安置在学校门口的一栋宿舍楼上，由一位女老师照顾。我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以前看过《南征北战》，只是看了老半天也没弄清楚好人坏人，这回可以亲眼看到打仗，我激动异常，趴在走廊的木栏杆上一面哼着歌一面等待，像在电影院等电影开场。“不是你们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一个小女孩打断我唱歌，推着我的肩膀问，“大头，好人死了叫洒热血，坏人死了叫什么呀？”“坏人死了不如狗。”我把大字报里的一句话说了出来。“那哪边是好人，是我们十中的‘毛泽东主义’，还是等会儿要来的‘毛泽东思想’？”我也不知道，早上在家里反复追问父亲这个问题，父亲不但没有告诉我，还警告我在外面不许乱说乱问。但看着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我忍不住，想逞能，灵机一动，我认真地回答她说：“等会儿看哪边能打赢，打赢了的就是好人，坏人肯定打不赢好人。真的。不信你看电影，最后都是我们好人赢了。”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那天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没来。既没看到“洒热血”，又没看到“不如狗”，我们都好扫兴。

后来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我家楼上的所有教室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红卫兵，据说有好几千人。教学大楼里没有厕所，晚上常能听到滴滴嗒嗒的水声从楼上落到我家窗前，臊哄哄的。白天，在教学大楼周围，常能看到用报纸或五颜六色的革命传单包裹的蘑菇状小纸包点缀着大楼四周的校园，弄得大楼四周臭气熏天，肯定是革命小将们晚上从窗户里扔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凡是落在沙地或草地上的纸包，都包得严严实实的，凡是落在硬地上的，都没包好。二是如果头天晚上下了大雨，第二天上午的新鲜“蘑菇”就特别多。我只听说过雨后春笋，没听说过雨后蘑菇。都说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新生事物出现，这是不是也算其中之一呢？不管它是不是，从那以后，我不敢在大楼附近玩耍，怕踩着“蘑菇”，也不习惯那难

闻的气味。

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上午，一位老师从北京串联回来，许多人在校园里围着他，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握完手后很兴奋，并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以前见过这位头上没长几根头发的老师，觉得奇怪，后来得知他荣幸地受到毛主席接见，并与毛主席握了手。据说他跟毛主席握完手之后立即乘火车回南昌，路上几天几夜都没舍得洗手。他为什么不洗手，难道他不懂讲究卫生？不管怎样，我还是好羡慕这位光头老师，很想挤上前去也跟他握个手。但我是个小孩，从未跟大人握过手，更不敢跟与毛主席握过手的大人握手，心里痒痒的，只恨自己太小了。我若是早几年出世该多好。

几天以后，我在学校的洗澡堂遇见这位光头老师，他一边脱衣服，一边跟别的大人说他身上有跳蚤，是从北方带过来的，夜里痒得睡不着。澡堂里的人渐渐走光了，只剩我和他。待他脱光衣服，洗澡之前他撒了一泡尿，我大惑不解，因为四面墙壁上都写了“请勿在澡堂内大小便”。我一直以为这话是针对我们小孩子的，没想到跟毛主席握过手的大人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顽皮。随地撒尿一定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哪一条呢？想了半天没想到一条有针对性的，接着我想起了以前幼儿园老师的话：饭前便后要洗手。他跟毛主席握手之后几天几夜不洗手，大小便之后肯定也没洗手，那么多的人后来抢着跟他握手，他们手上也会弄脏、也会有细菌吧？如果毛主席摸了光头老师的鸡鸡，大人们也会争先恐后地去摸他的鸡鸡吗？后来他闭着眼睛洗那几乎是光光的头，我乘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鸡鸡，试图发现点什么新鲜东西。他的鸡鸡很长，颜色很深，周围长满了头发，像支刚刚写完大字报还没来得及洗的毛笔。是不是晒多了太阳？都说毛主席是红太阳，太阳的光芒可以晒黑皮肤。渐渐地，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些问题：毛主席也有鸡鸡吗？如果有，那一定更黑，更像毛笔，因为他本身就是太阳，他的鸡鸡总在晒太阳。毛主席写了那么多诗词，写得那么潦草，我几乎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是从小开始练的吗？他小时候会不会像我们这些淘气的男孩子，撒尿写字？他的一泡尿足够画一首诗吧？我可能是在胡思乱想，毛主席不应该有鸡鸡。他要是鸡鸡，岂不是跟我们一样？

那几天，我天天仔细端详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试图找到毛主席与我们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我终于发现了两个秘密：第一，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看毛主席，他的两只眼睛都在紧紧地盯着我，难道他的眼珠子会在纸上转动，或是他生我的气了，知道我在猜测他是否有鸡鸡？第二，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我迫不及待地在这两大发现告诉下班回家的父亲，结果却被他严厉训斥了一通，他还告诫我不要到外面乱说，弄不好大人要坐牢的。过后他又给我解释正面、侧面、角度等概念，但我总觉得那张能看到两只眼睛的标准像是正面的，正面像上应该有两个耳朵才对。

停课闹革命的日子过得很慢，我在家闲得无聊，到处找玩的东西，有一次找到墨水和毛笔。好久没写字，我产生了写些字的冲动，先习惯性地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脑海里立刻出现的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接着写另一句时髦话：打倒刘少奇，但刘少奇三个字一个字都不会写，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只好在打倒后面再写一遍毛主席万岁。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读一年级时学的字都忘了，只会认不会写，没法子，只好在纸上随心所欲地乱涂乱画，再抬头看看墙上的毛主席诗词，比较一下我画的像不像他画的。我觉得还有点像，得意忘形之际，一不留神把墨水瓶碰翻。墨水流到桌边，把桌旁的一张毛主席像弄脏。这下麻烦了，我爸爸的一个同事，曾因不小心弄脏毛主席的画像而被揪出来，成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如果被人发现，我是不是也会被揪出来、像大人那样挂着牌子或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即使不被外人发现，我父亲可能也饶不了我。有一次我跟他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打得更重。这回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苦想了半天，最后我决定把它藏起来，藏在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以前玩过捉迷藏的游戏，今天要藏一张纸，对我来说不是很难，想了几个地方，最后决定把它藏在桌上那台“六灯交流”收音机里。刚买这台收音机时，每天下午听小喇叭广播，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知

道为什么收音机里有人说话，趁父母不在家，我曾打开过收音机的后盖，看看是谁在里面说话，发现有六支像注射器似的玻璃管子竖在里面，据说叫电子管。还有许多空地方，可以放不少小东西。我把那张毛主席像折叠到不能再折叠为止，然后放在收音机里的左下方，靠近喇叭下方的位置。把桌子收拾干净后，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等待父亲下班。那天下午仿佛过得特别快，父亲很快就回来了。为了掩饰我的错误，我主动出示我写的大字，希望得到他的表扬。没想到随意写的几个字，经他一看竟变成了“查维成毛主席万岁”，“打倒毛主席万岁”。恐惧了一下午，最后却意外地为另一件事——书写反革命标语挨训。我以为一顿痛打是不可避免的了，没想到父亲关上房门和窗户后，只是小声地训了我一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烧掉了，并压低嗓门用严厉的口气嘱咐我别向任何人提这件事。我重重地点头，写了“反动标语”没挨打的确是意外中的意外。谢天谢地，他没有意识到桌旁的毛主席像不见了。那时候常停电，我不喜欢停电，一片漆黑，且不能听收音机，不好玩，但那天是个例外，盼着早点停电，天一黑什么都看不见，父亲自然就不会注意到那不翼而飞的毛主席。过了一会儿，终于停电了，真好，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那几天天天盼晚上停电，那几天天天度日如年。

几天以后，我的心情渐渐不再那么紧张，但又一件事情发生，使我又极度担心那藏在收音机里的毛主席。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屋外有许多人大声说话，气势汹汹像吵架的声音，还有大声读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众人呼口号的声音。片刻之后隔壁屋里发出翻箱倒柜的声音。抄家，我的邻居被造反派抄家，我意识到。我那邻居是“舍得一身刚”战斗队的头子，我爸爸也是那个战斗队的，同属“老保”，只是我父亲不是很积极，这是我从父母亲的谈话中偷听到的，他们每次说话我都竖着耳朵听。如果造反派抄完他的家再接着来抄我的家，很有可能把收音机拿走，那就迟早会发现那张毛主席像，问题就严重了。我睡在床上，心在怦怦地跳，怀着从未有过的极度恐惧，等待着造反派冲进我家，等待着灾难降临。

大约半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抄家的人开着汽车离去。汽车声音消失后，我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

后来串联的人都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平静，但我的心情仍没有平静下来，整天琢磨着该把毛主席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还没来得及想妥，又一件事发生了。一天晚上，我母亲上夜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在家。深夜，我被父亲从梦中叫醒，听到外面救火车刺耳的警报声及呼啸的火声。不好，发大火了，我慌乱中赶紧穿衣服，但是停了电，黑暗中找不到衣服。父亲顺手卷起我床上的棉被披在我身上，又卷起他床上的棉被，夹在左腋下，右腋下夹着我家的最值钱的那台“六灯交流”收音机，带着我飞快地往外冲。跑出大楼外，我抬头一看，整个教学大楼的顶部都在燃烧，火光冲天。没过多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整个一层楼垮到下一层。

父亲把我带到附近一块草地上，叫我呆在原地别动，守着收音机，他再过去看看。看着那收音机，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躲在收音机里的毛主席。突然，二楼大礼堂播音室的窗子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似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人在火光的映照下从窗上跳下来，那情景使我联想起小人书里的狼牙山五壮士，又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一个跳楼的人。几秒钟后，那人朝我这个方向走来，还不时地回头看火。待他走近，我才认出他就是那位与毛主席握过手的光头老师。和我一样，他身上也裹着棉被。我像看着英雄一样看着他，同时也后悔自己跑出来时只顾逃命，关键时刻忘了喊毛主席万岁。

过了一会儿，他对着火光大声地自言自语，带着哭腔：“天啊，怎么得了，我所有的家当都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新买的，我是准备春节结婚的啊。”又过了一会儿，他真的哭了，对着大火，哭声越来越大。我从未见大人哭泣过，看到他哭我心里也很难过。他表情很痛苦，全然不像上次在校园跟大家握手时那样。他还不时地跺脚，来回走动，一不小心露出了鸡鸡。原来他睡觉没有穿裤子。我还发现，他的鸡鸡比上回在洗澡堂时短了许多，几乎看不到。难道鸡鸡



还会越长越小？

看到他那在火光中时隐时现的小鸡鸡我就来了劲，忘了寒冷，忘了惊恐，我的眼睛像追光灯一样盯着他的那个部位。他可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握过手的人，我自然就想到了毛主席，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困惑我多时的“毛主席的鸡鸡”问题，即使在一片火海面前也不例外。

身后不远处是《江西日报》社的一栋宿舍楼，许多居民被惊醒，趴在窗户上看大火，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个人大声说，“这大楼是木头地板，地板下面有隔音草，草经过特殊处理，涂了油，防虫防蚁用的，但容易着火燃烧。这么好的教学大楼烧掉了真可惜。”还有一户人家打开收音机，我在凛冽的寒风中听到了那熟悉的歌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红小兵还有一个问题想对您问：您究竟有没有鸡鸡？“嗨，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忠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也衷心祝愿太阳上面没有鸡鸡，没有鸡鸡，没有鸡鸡，要不然那鸡鸡一定会晒得太黑，烤得太焦，我长大了会失望，长大了失望可能就是大人们说的大失所望。

“毛主席啊，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轰”，又一声巨响，淹没了歌声，整个大楼在歌声中倒塌。

第二天，《江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意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广大革命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火海英勇搏斗，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谱写了又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就在现场，自始至终目睹了报纸上所描述的事情，但也感到极为困惑：这么好的大楼烧掉了，我的小人书、皮球、玻璃弹子等一切心爱的玩具都统统烧掉了，也算是一曲凯歌？凯歌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萌发了担忧和焦虑，我觉得我越长越糊涂。以前幼儿园的老师常表扬我，说我聪明，喜欢动脑筋，可现在我既分不清好人坏人，又弄不懂一些常用词的意思，许多以前会写的字现在也不会写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担心长大后成为白痴。光头老师的鸡鸡都会越长越短，我的脑袋就不会越长越傻吗？

我真的很担心。那担心困扰着我的整个童年。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九）

• 老 田 •

（续上期）

## 二十一、从批派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届人大之后，我们看不到春风度过玉门关的气象，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然是有名无实。还没有两个月，四川就开始“批派”运动了，省里面首先发动，发了很多文件。赵紫阳到重庆以后，先不到市革委会跟我们见面，他在渝中区作报告，讲成都“8 2 6”和“兵团”有派性；有人说没有资产阶级派性，怎么没有？批派性是全国都在批，我们四川的“四大名旦”

又要表演了嘛，批派的目标就是“四大名旦”；资产阶级派性在这里就有两个政客，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你们要注意，造反派就像水面上的鸭子，水面上看着没动，水底下它的脚动得凶。赵紫阳在会上没有讲他钦封的“四大名旦”是谁，下来之后说就是“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杨志诚听说赵紫阳要把他作为主要批派目标，在家坐着哭。

在鲁大东的授意之下，物资局党委书记李永江跑到市革委会，说物资局、木材公司的群众要求我回去参加批派学习，这个人也是个老红军，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我回到木材站，看到一张迎接我回单位参加“批派”学习的大字报，题目是《派性在木材公司的二十种表现》。会场坐了几十个人，发言都没有点我的名字，最后我说要讲话，他们也欢迎。我说：李永江请我回来，是为了让你们发难，你们又不点名。我说毛主席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们家里就有派性。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讨市里走资派的高兴，你们是怎么对待群众的？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年文革教育了群众，他们都有眼睛，他们心里有是非，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走资派自己没有搞清楚，你们以为还可以象文革前那样，想怎么运动群众就怎么运动吗？不行了，运动初期你们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是你们先整我，还是我先整你们的？我讲这个人事制度、档案制度不合理需要改变，只要你的档案里面被人塞进去一个小纸条，你一辈子就翻不了身，这些事情不是没有，有人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去，说我与古巴的格瓦拉有勾结，你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吗？你们自己的档案里面又如何？你们能够应付这样的构陷吗？档案制度、人事评价制度不改行吗？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们是我的同志，这几年我浮在社会上，与你们的接触和关心少了，这是我的不好。派性，毛主席讲过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什么稀奇。鲁大东们不是要你们批判八一五和反到底的派性，他是要你们批判造反派，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你们要说走资派的权力和尊严是不容挑战和冒犯的，因此八一五和反到底都是要批判的，你们的领悟能力太差。我们一般工人和小干部没有特权和既得利益，只要是你对特权和既得利益有意见，就是派性，你们没有搞清楚吧。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到底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三项指示为纲，这中间的差别需要好好掂量。参加会议的几十个同志听了我的发言，都默不作声，只有支部书记杨百珍以规劝的口气说：黄廉你要正确对待，李书记一声不吭，夹起皮包就走了。

回去在市革委会一号楼吃饭的时候，鲁大东对我说，别人喊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对群众还是要正确对待，我说群众没有说啥子。鲁大东说你还是心中要有毛主席，中央一句话要你垮你就垮了，批派性是中央和省里叫搞的嘛。我回答说，不要说中央，你在重庆说了也算数，文革前你们都不知整死、整垮了好多人，我一个群众代表垮了算什么。

此后我们就与批派的干部形成了公开对峙，我们要求反右。我和周家喻不得不去成都找赵紫阳，他写好了稿子到会议室来跟我们见面，说很欢迎你们两位过来，我也想找你们二位谈谈，事情太多耽误了，你们来了我们就好好摆一摆。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调到四川来工作，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跟你谈话的？周家喻插话是邓小平调你来的吧，赵紫阳回答说人家主持工作嘛，那还用说吗？我追问他在渝中区给干部作报告说“四大名旦”的事情，他说那只是形容而已，你们在文件上面签名都是四个人嘛。我又追问他说造反派是水面上的鸭子，多少人被整得半死不活，倒是没有听到你说一句话。他说派性还是要批的，依据就是有人不搞团结，不搞生产。我问他到底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新中国历次运动出来的积极分子都受到正确对待，唯有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从“二月逆流”到“批清”，现在又来一个“批派”，文革初期资反路线时期重庆的老保“工纠”有一句话“站不完的队，流不尽的泪，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你们是不是在代表工纠，执行“秋后算帐”步骤。你在重庆做报告，又是号召整群众，总是要在群众中间去纠坏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赵紫阳说，恐怕二月逆流不复存在了，反到底受压也不复存在了，你要相信我。然后就拿出他事先写好的字条开始念，大意是：各地批派不能挑起新的派性，不能乱扣帽子；各个单位

批错了的，要立即停止，并赔礼道歉；造反派进入革委会是副主任以上的都要安排日常工作，不能吧他们当陪衬；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文件。然后就说去吃饭。这是我们这一次见到赵紫阳，我对这个人的感受是：处事圆滑，很有应变能力，善于耍政治手腕，应付我和周家瑜的问题非常灵活而富于变通，处处留下“分而治之”的余地。

我们当时从清华大学得到谢静宜的一封信，还有毛主席对刘冰告状信的系列批示，从全国造反派的处境和我们自身灾难不断的体会，深深感到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只是一句空话，当权派复职后就处处对造反派进行或明或暗的报复，许多领导人就是或明或暗地充当这样一股思潮和政治意愿的代表，鲁大东、赵紫阳莫不如此。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都是遭到他们的集体排挤和抵制，我和周家瑜的一致意见要揭穿这一切，我们还能够从各种渠道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声音，我们是造反派而不是投降派，我们就到处传达，到各个大厂去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文革不是叫我去市委去做官，成千上万的造反派牺牲了，是为了保卫革命路线，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支持我们，监狱进去了再出来，时至今日走资派仍然在极力反扑，主席和总理还在他们就敢这么顶，还没有到秋后，帐就已经算了好几遍了。他们敢一手遮天，我们就敢捅破天，今天市委还是象文革初期那样封锁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本就不向下传达，还在愚弄群众，我们就相信群众，好在我们还有点影响。

1976年3月21日，我们与鲁大东说好了，他也同意我们去建设厂传达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第二天我们去调车，车队的人说鲁大东打了招呼不去了，我们骂了他们一顿，说我们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他们恰恰选择了当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狗腿子。队长没有办法又回去请示鲁大东、丁长河他们，丁长河说让他们去，这样才给我们出车。去了之后，我和周家瑜已经上了主席台，鲁大东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报告不能作，我说不是事先已经请示你同意了吗？他说我们不同意，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就感到鲁大东在设陷阱。果不其然，建设厂干部开始部署起哄捣乱，会场上起哄被我们压下去了，出来之后，建设厂个别干部竟派人把我们的汽车轮胎给划破了，有工人以我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室挂电话，说黄副主任要车，结果又开来一台华沙车接我们回去。

五月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长文，周家瑜改了一些，发表在《重庆日报》上，占了两个版面。报社的人说还是你们敢说话，清样排好了，鲁大东不让登，还说不撤文章就撤人，我和周家瑜带着总编去找鲁大东，说今天不上这篇文章，我就去把机器砸了，明天你就不要想出报，结果还是鲁大东责成总编对文章进行修改，这样才勉强同意登出来。过了一个月，我又写了一篇《评杜鹃山——向柯湘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市委就跳起来了，要换人。我们揣了稿子去找赵紫阳，问他这篇文章怎么样，问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怎么样，赵批给《四川日报》发了。文章发了之后，我们回去就以这些观点下厂矿去宣传，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必要性告诉全社会，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鲁大东对储运公司经理童野讲“黄廉不是坏人，我们就是坏人。”斗争的性质确实就是鲁大东定性的那个样子。

## 二十二、落实三结合与组织路线上的最后斗争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纳新，结果受到走资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文革期间在干部和党建政策上，说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当权派的全面抵制。不仅新人无法提拔，就是在当初成立革委会进入班子的群众，也没有起到监督作用，不仅是当作花瓶和摆设那么简单，而且长期受到排斥和打击。底下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对我们上面的施加压力，说我们投降叛变了，中央打了招呼，为什么不监督落实？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有一系列的明确指示，他们仍然是置之不理，这不是个别现象和出于慎重考虑，而是长期、系统地抵制

毛主席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系统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当权派都是长期坚持排斥文革的积极分子和新生力量的，特别是在1973—1974年之后，我深切地感到各地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回潮，而基层的群众和造反派却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上下两个方面对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都有很大的压力。文革过后，他们却把自己掌权时期的种种黑暗和消极现象，转嫁给长期受他们打击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头上，说都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破坏和主导的结果。

因为意见积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里面扩大到部局长一级，省里面开会也是要求他们“转弯子”，不能把群众代表作为挡箭牌，有问题的时候就用他们来应付群众。市委就把责任推到部局长们身上，说是下面的转不过弯子。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下面的人都说愿意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下说鲁大东不转弯子，岳林也认为市委和市革委会应该遵从中央的文件，转好弯子。到会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个文件，明确提出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在会议高潮的十来天时间里，鲁大东时不时出席，让参加会议的部局长在那里空谈。我把电话接到会议现场，当着与会部局长的面，给赵紫阳挂电话，说鲁大东顶住中央精神，十多天油盐不进，请他亲自到重庆来解决问题。赵紫阳说他不能离开成都，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汪友根和蔡协斌亲自到重庆来传达了两次，赵紫阳还说是不是请你和周家喻到省里来一下好不好，我在军区有一架工作用的飞机，可以派飞机把你们两个接到成都来。我说部局长们要求要省委来重庆帮助解决问题，要么就是大家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与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会委员也同意，说把这个会移到成都去开。这样就请交通方面的职能部门解决交通问题，派车去成都，因为考虑到老同志比较多，就要求每车配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鲁大东单独把我叫到五招待所，在芭蕉林的平房里谈话，他说你们这么搞省委怎么想？我说是你鲁大东无能，你认为你一个人比200多个部局长高明，压着中央精神不让落实，想要一个人一手遮天，我们只好直接去省里了。他说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不能组织部局长去省里，这是很错误的，你要考虑后果。我说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鲁大东说，你无非是为你的入党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嘛。我说你鲁大东惯于颠倒黑白，我从来没有向你提出过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是200多个部局长到底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从1968年成立革委会以来，你从来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都是玩弄权术，是你本人一手造成的，你本身很无知，群众对你看得很清楚，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转弯子”，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你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群众对你的印象会好吗？

鲁大东说，我还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吗？笑话，我参加过七大，见毛主席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见的中央领导比你多得多。鲁大东激动起来了，说，我不执行吐故纳新政策，你知道是谁把汪友根推荐到省委的，是谁把熊代富安排当市团委书记的，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来顶，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市委的方向问题，我没有老资格跟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说的那几个人，你心里最清楚，成千上万的群众代表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情况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们谈的是多数人的问题，你在组织路线上还是在执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那一套，还是文革初期组织保守派保护你们特权的那一套手法，你心目中真正的造反派成见很深，你玩的是一种权术。鲁大东同志，我很不客气地跟你讲，你确实算是个党棍、党阀，把党的威信作为你个人的权术工具，我这是从文革到现在就你的行为表现来讲的，历次运动承受打击的都是群众，每一次运动你们都玩弄权术转移斗争目标，文革初期的错误我们不讲，从清队、清查五一六到批派运动，你鲁大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整谁就整谁，为什么每一次运动你都搞错了，灾难都是落在群众头上，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鲁大东最后说，你是铁了心要把他们弄去省委了？我说你能说这200多部局长都是派性

作怪吗？我说愿意去的才上车，到省委身边去解决问题，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去，也希望鲁大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去。他说我有事情。

那个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天已经热了。第二天早晨，参加会议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车，往成都开。我看到市委领导干部里面的钱敏、丁长河和徐庆如都在车上。车子开到成都锦江宾馆之后，宾馆说没有准备饭，还说省委没有喊我们准备房间，赵紫阳就这样耍两面派。我找到总服务台，周家喻说他是常委，要服务员拿钥匙来开门，结果只开东楼的两层楼，房间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赵紫阳，他避不见面，我说赵书记不是要拿飞机接我们来吗？怎么我们来了又不见面呢？赵的秘书说，你们都来了，重庆还工作不工作？我说重庆还有鲁大东嘛，没有鲁大东还有其他人嘛，怎么会停止工作呢？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同僚的回忆，他头天下午带了两个办公厅的处长，赶在我们的前面，连夜就去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坝招待所面见了省委主要领导，与赵紫阳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赵紫阳和鲁大东就分别找各个部局长做工作，几个人一组，分别做工作。把我和周家喻，还有几个副主任和常委甩在一边。我下来说，鲁大东已经在省委，要跟你们个别谈话。做完一批就走一批，部局长们经过三天的工作，就走得差不多了，每天重庆都有很多小车来接，我问物资局赵局长，他说打招呼是有，有个解决方法问题。周家喻说人家权力比我们大嘛，赵紫阳出面进行各个击破。我说省委这样做很不严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通过这一件事情，我进一步体会到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斗得死去活来，都是找错了对手，真正的对立两派是当权派和造反派。

后来他们派蔡协斌、汪友根来找我，我把汪友根臭骂了一顿。蔡协斌说你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对的，中央讲了底下不执行怎么行呢？但是要讲究工作方法；他苦笑着对我说：黄廉啦，一种旧意识的消亡是何等痛苦和艰难。我住在西楼跟服务员摆龙门阵，小顾告诉我周家喻已经回去了。赵紫阳善于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总台告诉我赵紫阳来找过你。晚上赵紫阳一个人来找我，他告诉我其他人都回去了，我说你的分化工作做得好嘛，我还没有底，所以在这里等你来，你是个两面派。赵紫阳说省委有省委的考虑，我们也有自己的威信；黄廉你先回去，好好与鲁大东交换意见，赵紫阳还说你的工作安排不是在省委；中央领导还是很关心你的。我说鲁大东玩弄权术已经七八年了，我不当这个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后周家喻就很听话了，人都不好找了，各个部局长回来之后，就再也不谈转弯子的问题了。中央的政策和路线，就是这样继续胎死腹中。

过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说要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周家喻在重庆市分管宣传。省里面的七个群众副主任也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邓兴国管工交，王恒霖管计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云管宣传。重庆市李木森不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挥部里头当副政委。我心里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落实何等艰难。下面的群众长期挨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荣誉职位和空头官衔也就有安慰作用，转弯子和吐故纳新的组织路线，在下面就是这样搪塞过去的，孙悟空当“弼马温”开初也是很高兴的，基层没有地方就塞进生产、财务里头，没有官衔就帮助看车间安排当一个班组长。后来说文革中间造反派如何夺权，1976年给造反派“补台”，也就是造反派掌权“最多”的时候，重庆和四川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来不去计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计委主任是个善良辛勤的老太婆，她要我去看文件批阅文件，我说你这是戏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我干什么，我看了文件头都大了，我说你们干部要换，找我商量吗？那时正当钟表厂要上一台进口设备，向省里申请外汇，省里就是不批，要我去省里办这个事。林老太婆夹着个皮包找到我家里，说你看这个报告省里平衡不下来，市委讨论后想请你跑一趟省里，我说你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叫鲁大东去，我说我不再受你们的戏弄，我愿意回原单位去当小秘书。林老太婆说上次省里把部局长劝

回来，但是全省的问题都借此解决了，还是有促进作用嘛，你不要怨我们，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钱敏找我，还是要我去省里走一趟。我心里想着出去走走、听听也好，就拿了东西准备去。跟我调车的时候，说把最近弄来的奔驰 5 0 0 给黄副主任跑长途，这些个方面当权派们倒是很注意拉拢工作。到了省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重庆和省里在分配财政收入上的矛盾之深，在下川东的财政收入支配方面争执很大。我找到王恒霖，他说老干部不同意，说重庆市的用汇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了，事隔几年之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才给钟表厂进口设备的外汇指标。在给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办不成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毛主席说关心和培养新生力量，他们就是这么“关心”的，你办不成事情正好，他们在一边高兴，反过来在口号上倒是说的蛮好听的，什么“传帮带”“提帮让”。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